

返乡创业三年迎丰收



6月30日,浙江省嘉兴市,吴斌的蓝莓园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他苦心经营3年的蓝莓园里挂着一串串青紫相间的浆果。

1985年出生的吴斌毕业后,曾在嘉兴市一家日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觉得“不自由”,想返乡创业。“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大学生,又当农民种田?”起初,吴斌的父母强烈反对,但是对于儿子认定的事,做父母的又要无私地支持。种蓝莓并不是“速战速决”的创业项目,吴斌经历3年的漫长等待才有收成。

田建明/CFP

“老板”书记的富村梦



6月30日,刘伟平(左)在剑霞村一处生态白莲基地内与村民、村干部交流。

在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剑霞村,今年39岁的党支部书记刘伟平还有一个“外号”,叫做“老板”书记。16年前,刘伟平从打工仔做起,直到创办品牌餐饮公司,成为身家过亿的企业家。2012年,刘伟平回到剑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百姓致富。

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 摄

40多位农民工在高原工地上集体过生日

独具川味的高原生日宴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我在外打工10多年了,今天是我在青海高原工地上过的第一个生日,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生日蛋糕,蛋糕很甜,我的心里更甜!”在工地参加完集体生日的四川籍农民工朱有成动情地说。6月27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门诊综合楼工地项目部一片热闹场面,40余名生日在6月份的四川籍农民工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生日,在青海高原品尝家乡风味的“坝坝宴”,不仅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也一解思乡之苦。

一个生日蛋糕,“九斗碗”蒸菜,一句生日祝福……该项目部工会通过此类温情的表达,让外来务工人员真切感受到项目部的温暖,感受到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关爱,让这些曾经在全国各地流动的农民工们在中建三局西宁项目部找到了“温馨的家”。

据介绍,40多名农民工大多数来自四川省,他们远离亲人,只身赴青海高原投奔工程建设,项目部工会在筹办集体生日联欢聚餐时也依照四川特色取名“坝坝宴”。“坝坝宴”是四川地区汉族特色菜肴之一,其特色是蒸菜,原意是以蒸菜的九大菜而得名,也称“九斗碗”。项目部举办“坝坝宴”集体生日联欢聚餐,目的就是让奋战在工地上的农民工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和关怀。

伴随着温馨的生日快乐歌,40余名农民工一起点燃生日蜡烛,默许心愿。软炸蒸肉、清蒸排骨、粉蒸牛肉、蒸鱼、酥子丁……工地四川厨师精心制作的“坝坝宴”特色菜肴端上来了。此刻,施工现场欢声笑语响成一片,员工们也享受着此刻的温馨与美好。

“在紧张的施工生产中,难得有这样轻松自由的一刻,大家分享着生日蛋糕和精美菜肴,放松心情,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下阶段的工程生产中。”农民工李玉煜说,该项目部经常举办联欢活动,让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在项目部有了认同感、归属感。

在徐金喜离家工作的时候,家里那台21吋老式二手电视机成为妻子唯一的陪伴,“她不一定看得懂,不过,眼前有人在晃动,耳边有声音,多少让她不寂寞!”徐金喜这样描述自己对妻子的照顾。在徐金喜的眼中,妻子越来越像个婴儿。

人们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徐金喜说,妻子嫁给他后一直勤俭持家,生儿育女,付出了很多,“不管她以后变成什么样,我都要守着她。”

为给妻子治病,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已经负债15万元,儿子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了,女儿大学毕业在医院工作,日子虽苦虽难,徐金喜仍然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家庭都稳定了,就能早点还完债,能早点把孩子妈妈送到武汉的大医院好好治疗。”在徐金喜心中,因为经济问题无法让妻子得到最好的救治一直让他倍感愧疚。

李胜荣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经常只是痴痴地笑,枕头被汗水打湿了一大片,因为无法说话,她只能通过简单的哭和面无表情来传递自己的思维。

在徐金喜离家工作的时候,家里那台21吋老式二手电视机成为妻子唯一的陪伴,“她不一定看得懂,不过,眼前有人在晃动,耳边有声音,多少让她不寂寞!”徐金喜这样描述自己对妻子的照顾。在徐金喜的眼中,妻子越来越像个婴儿。

人们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徐金喜说,妻子嫁给他后一直勤俭持家,生儿育女,付出了很多,“不管她以后变成什么样,我都要守着她。”

月平均工资近万元,单位缴纳工伤保险的基数仅为2000元,工伤赔偿款少了几十万元

矿工诉企业少缴社保获赔

北京、辽宁、湖南等规定了差额补偿,多个省份未作出明确规定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因企业少缴社保费致使自己的工伤保险待遇“缩水”,辽宁省朝阳市朝阳程先生将企业诉至仲裁委。但今年6月初,就在开庭前夕,单位同意与程先生协商解决,程先生获得伤残津贴等差额赔偿40万元。

老家在陕西农村的程先生告诉《工人日报》记者,2013年3月,他来到朝阳县一家铁矿,从事井下采矿工作。当年11月,铁矿坍塌,致使他被砸伤。

朝阳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认定程先生受伤为工伤。2015年1

月,经朝阳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程先生的伤残等级为贰级。

2015年2月,单位向工伤保险基金为程先生申请了工伤待遇。记者从程先生提供的材料看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万元,按月伤残津贴1700元和按月护理费1285.2元。

但单位给我缴纳工伤保险的缴费基数仅为2000元,这样一来,我的工伤赔偿款少了几十万元。我在网上查到,2014年陈剑峰律师在我们县办理过一个类似案件并且

胜诉了,于是给陈律师电话咨询。”

2015年3月,经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陈剑峰律师代理,程先生将单位诉至朝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6月,在仲裁委通知开庭前夕,铁矿老板委托律师找程先生谈判,表示愿意给予35万元赔偿。

但陈律师的意见是,除了工伤保险基金应付的伤残津贴以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万元之外,单位需另付伤残津贴等差额赔偿40万元才能接受。双方僵持了5天之后,铁矿老板最终同意了程先生的赔偿要求。

陈律师表示,本案之所以这么顺利解

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此前他代理了一个相同的案例,也是在朝阳县人民法院判决的,胜诉的判决对于本案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陈律师发现,尽管此案获得胜诉,但在多年的工伤案件处理的实务中,企业少报职工工资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的职工的实际工资达到6000元以上甚至更高而缴费工资却不到2000元,这导致工伤保险待遇差额则几十万,多则100万元以上。”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导致各地对此裁判可能不尽一

致。目前在北京、辽宁、湖南等省规定了差额补偿,但还有不少省份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对此,陈律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或工伤的进一步司法解释中应明确差额补偿的规定,除了类似“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降低部分由该用人单位支付”之规定外,最好规定工伤职工可以一次性获得差额补偿,不要规定按月支付,因为企业一旦倒闭,职工的利益可能无法保障。

工伤保险待遇缩水,职工该怎么办?

一位基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向记者透露:“我们一般只按用人单位的缴费工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报多少,我们就按照多少去核定。”

“用人单位在实际工资数额以下申报职工工资数额,少报缴费工资,处于没有监督的状态下,这已经成为用人单位少缴工伤保险费、节约成本的惯用手段。另外也

有的存在当地政府行为、对某些行业一刀切所致。”张律师说,“有的地方默许企业按照社会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

工伤保险待遇“缩水”,该怎么办?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陈剑峰律师对《工人日报》记者说,职工可以采取三种途径维权:一是与用人单位协商,要求其到社保机构补足差额。如果单位拒绝或者拖延不办,可

以向本单位的工会组织求助,或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如单位补足了社保费,职工就可享受正常的工伤保险待遇。

二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是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后,在享受国家社保支付的较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待遇后,通过仲裁、诉讼等渠道维权。在提起劳动仲裁时,一并提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支付。在打官司过程中,工资条是最好的证据。

但陈律师特别提醒,如果伤者是一~4级伤残的严重工伤,最好要求单位补足社保缴费基数。他解释说,1~4级伤残可按月享受伤残津贴,而伤残津贴是要享受到退休或正常死亡的时间很长。所以,对于1~4级伤残的工伤者来说,一定要想办法让单位到社保按照月实际工资缴纳社保,这样待遇就有了永久保障。

海南万宁:“阳光低保”惠民生

据新华社海口6月29日电(记者张玉洁)“曾经,群爱村一些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定的贫困户迟迟得不到救济,而当地很多生活殷实的村干部家属却成了低保对象。”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群爱村党支部书记郑春成说。

“现在,符合条件的群众可直接或委托村干部及政府基层雇员向户籍所在地镇政府或农场提交低保申请,无需再经村委会盖章,避免暗箱操作。”万宁市民政局副局长黄会杰介绍。“如今群爱村已经成为实行“阳光低保”的示范村。村民蒋应涛告诉记者,因为妻子陈秀奎行动不便还患有精神疾病,唯一的儿子又因严重心脏病长期卧床,家里十分困难。“我们不懂得申请低保,是镇里了解情况后派人下来指导我们如何申请。”蒋应涛说,“去年镇政府还派人下来发放政务报,还告诉我们新的政策,教我们如何维权。”

青海祁连县:为农民工讨回17万元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李渊 严久芳)“感谢政府劳动部门和法院的大力帮助,我们终于拿到拖欠了近3年的血汗钱了!”近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农民工庞巨龙等领到了被拖欠工资17余万元。

2010年4月到2012年7月,庞巨龙等为祁连县某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该公司共计拖欠庞巨龙等农民工工资85560元,该案经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仲裁该矿业有限公司支付庞巨龙等农民工的双倍工资171120元。但裁决生效后,该矿业公司仍未如期履行给付义务。庞巨龙等人无奈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在法官的不断努力下,矿业公司最终将17余万元的农民工工资款全部付清。

“安全生产月”宣教会走进施工现场

本报讯 近日,北京海淀区马连洼街道2015年“安全生产月”宣教现场会,在中关村软件园中建三局腾讯北京总部大楼项目部举行。

马连洼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建筑施工企业是安全生产领域的主力军,该活动旨在提升企业的责任和安全意识。会上,中建三局北方公司副总经理兼项目经理黄道军介绍了项目的经验成果。特别是在安全管理上,腾讯北京总部大楼项目通过物联网技术,发明了高支模架体监测感应系统,对事故高发区进行实时监测,一旦超限现场将声光报警,确保现场施工安全。(冉满满 周晓宇)

柯城农商行扶助农村青年创业

本报讯 日前,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小额贷款扶持农村青年创业工作会上,大学生村官程超等10名青年创业大赛获奖青年,领到了“丰收——青年创业卡”。凭此卡,可到农商行贷到8万元~30万元的贷款。

据了解,由柯城团区委、柯城农商行、柯城区农办在全区推出“丰收——青年创业卡”,年龄在40周岁以下,柯城区域内具有较强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青年、二次创业企业家和回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均可申请办理。该项业务一经推开,迅速得到推广。目前,累计授信3809万元,扶助200余名创业青年进行创业。(袁慧康 管建芳)



农民工维权面临难题,搞不清维权对象是谁

昆明工地维权可“按图索骥”

建设单位、总施工单位、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详细信息及工资支付方法都可在“农民工维权告示牌”上找到

本报讯(记者黄瑜)6月13日,《工人日报》记者看到,昆明西山区润城四期施工现场张贴一张“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公开了该建设项目负责人、劳工管理员等联系方式以及维权举报电话,方便农民工投诉举报。

“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可能很少看报纸和电视,所以政府出台的很多制度还有一些维权依据都无从了解。”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庆说,从今年3月底开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分批次于在建工程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标明建设单位、总施工单位及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详细信息,明确工资支付形式、计算方法、支付周期等,方便农民工投诉维权。

据张庆介绍,昆明市目前有1000多个在建工地,建筑领域农民工超过50万人,由于建筑领域用工管理混乱,工资支付不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工资不能按时足额支付,致使有的农民工付出了劳动却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严重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014年,昆明市劳动监察机构处理的因拖欠、克扣或不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引发的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340件,为3.67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3.8亿多元。春节之前,此类问题更为突出,仅2015年前两月,劳动监察机构为劳动者追发的工资待遇就达3.5亿元。

“由于工程层层转包现象严重,现在农民工维权面临的最大难点是搞不清维权对象是谁。”接手处理过多起农民工维权案件的云

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芳说。“而告示牌的设立,对农民工而言,无疑是给出一份详细的维权‘攻略’,上面不仅标明工程建设单位、总工程师承包施工单位的名和地址,还有项目部经理、劳资人员、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和负责工资发放人员的名字与联系电话,并明确工资支付形式、工资计算方法、工资支付周期,一旦发生拖欠工资等事件,农民工将能够明确的找到维权对象。”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监察支队队长王正军说,“告示牌还载明全市劳动监察机构的维权电话,告知农民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当渠道,让农民工能够找到维权的对象,减低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

根据要求,“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应在项目

目工地开工前由施工单位制作和悬挂,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方可拆除。施工单位设置和拆除告示牌时,应现场拍照留证,在向辖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申请缴纳和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时,附上现场留证照片,告示牌上还应明确施工单位的义务和农民工的权利义务,除了能指导农民工妥善保管好维权证据外,也让农民工了解,不得参与以讨薪为名追索工程、尾款、质保金等群体事件,配合用人单位管理。

设立告示牌之后,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还将实施一系列举措,有拖欠记录企业,若再发生新的拖欠情况,有关部门将落实“黑名单”制度,录入银行征信系统,清理出云南省建设施工市场。

“她不一定看得懂,不过,眼前有人在晃动,耳边有声音,多少让她不寂寞!”

泥瓦匠和他的特殊“孩子”

本报记者 张昀  
本报通讯员 陶火应

清晨4点,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高桥村村民徐金喜的家中就亮起了灯,已经50岁出头的徐金喜是一名普通的泥瓦工,摸着黑起床只为照顾自己身边一个特殊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2007年2月徐金喜的妻子中风偏瘫后,照顾妻子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如今,稀饭是这个家庭固有的早餐,熬煮稀饭的近一小时里,徐金喜洗完了夫妻俩头一天换下的衣物,“武汉天热,衣服天天都得换,都要洗!”

紧接着,徐金喜开始照顾妻子起身,洗脸梳头,斜靠在床头的妻子,整个右半身都无法动弹,全靠徐金喜一人扶持。喂饭是艰难的事,常人几分钟就能喝完的一小碗粥,徐金喜硬是喂了快半小时,记者注意到,这顿早餐能够下饭的只有一点腌菜。

清晨7点,在伺候完妻子吃饭、吃药、穿

好纸尿裤后,徐金喜简单地扒了两口菜,就蹑手蹑脚地上工了,身为泥瓦匠的他,常年在建筑工地打工,在妻子病后多年,他的务工收入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现在的工地距离家有大约3公里,工地上有食堂,他中午吃过饭后,还能打上一份饭给妻子送回去。妻子早中晚都需要服药,因而身边不能离开人。2011年,徐金喜在新洲区郝城街城南一处工地务工,为了照顾妻子,他把妻子带到了工地上,当时,七八平方米的工棚,一张木板搭成的床占据了大半空间,妻子

李胜荣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经常只是痴痴地笑,枕头被汗水打湿了一大片,因为无法说话,她只能通过简单的哭和面无表情来传递自己的思维。

在徐金喜离家工作的时候,家里那台21吋老式二手电视机成为妻子唯一的陪伴,“她不一定看得懂,不过,眼前有人在晃动,耳边有声音,多少让她不寂寞!”徐金喜这样描述自己对妻子的照顾。在徐金喜的眼中,妻子越来越像个婴儿。

人们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徐金喜说,妻子嫁给他后一直勤俭持家,生儿育女,付出了很多,“不管她以后变成什么样,我都要守着她。”